



中共宁夏党史概述（四）

邢万莹

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

在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党的组织曾几次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但是，革命活动并未因此而停止。

1937年8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派联络局副局长张子华（即王绪祥，宁夏中宁县人）以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代表的身份来宁夏做马鸿逵的统战工作，交涉在宁夏省城建立八路军办事处，释放红军长征、西征中被俘人员及边境有关问题，他利用当年的故旧关系秘密建立了以袁金章为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小组。组织“宁夏抗日少年战地服务团”从银北到银南利用演讲、演戏、漫画画等方式进行抗日宣传。

同年10月，中央决定建立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开辟对宁夏省国民党统战工作，书记先后为杨一木、李仰南。正当宁夏工委积极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时，曾被混入定边活动的特务马自成发现，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经中共宁夏工委决定，将大部分党员于1939年春撤回边区，留在宁夏的只有白玉光、杜琳、马云泽等。

1939年底，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派崔景岳、王博来宁夏与白玉光等在青铜峡小坝学校组建了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书记崔景岳，组织部长白玉光，宣传部长王博。正当宁夏工委领导其下辖的五个支部36名党员深入开展革命活动时，由于杜琳同志言行不慎，警惕性不高，被国民党宁夏军警联合督察处所派特务李郁华跟踪监视，1940年4月13日晚，崔景岳等34名同志先后遭敌逮捕。在狱中，崔景岳虽然一次又一次被上大刑，受了皮肉之苦，但他毫不屈服，继续说服和领导同志们进行坚决斗争。

在敌人软硬兼施无可奈何的情况下，1941年4月17日，崔景岳、孟长友及在盐池回六庄被敌人骑兵抓捕的陕甘宁边区回民工作团团长马文良3人惨遭活埋，英勇就义。

不久，党组织又从不渠道派来的回族青年何自成等党员和革命青年，正当他们进一步深入革命之时，又遭敌特机关破获。何自成受尽酷刑，敌人用竹签刺透十指，但他仍然谈笑风生，鼓舞战友斗争。1943年4月17日，何自成、毛达（毛英华）陈硕南、刘斐4名同志在崔景岳等

同志就义的地方再遭敌人活埋。

这两次事件，使我党遭到在宁夏建立组织以来最惨重的损失，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无情，也唤醒我党吸取沉痛的教训，在敌人严密封锁切实防范的情况下，为今后的胜利要采取更有策略的手段，进一步提高革命斗争艺术。

1942年9月4日，中共三边分区委员会研究决定，成立中共金灵工作委员会，书记何广宽，组织部长徐宗岳，宣传部长江云。鉴于以往的教训，机关驻在陕甘宁边区的盐池县曾家畔，主要任务是对宁夏国民党统治区中层人物进行统战，在基层建党，进行社会调查。后因地方工作由三边分区委员会改为三边地区委员会承担且调走了一些同志，中共金灵工委于1943年3月1日撤销。

这时，党在宁夏各县的工作便由新建的余庄子、红井子、三段地3个据点来领导。

1945年3月，中共三边地委决定成立河东工作组，组长赵文献，副组长梁大均，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宁夏工作的领导，明确提出了发展党员的主要对象是工人和农村贫苦农民，年底共发展党员60余人。

宁夏党史大事记（一）

邢万莹

1925年8月	国民军联军冯玉祥部第二师刘郁芬等部队经过宁夏开往兰州时，在该部做政治工作的中共党员宣侠父、钱清泉等，曾在平罗、银川、宁朔（今青铜峡市）、中卫等地进行了革命宣传。
1926年9月	钱清泉赴陕北与陕北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带领李临铭、牛化东、吕振华、王兆卿等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30余人途经宁夏赴兰州军事政治学校参加学习。为急需加强宁夏工作，支援部队过境。因而，钱清泉应驻宁国民军联军中党组织的要求，请李临铭、贺维新、马思然、陶振亚、郭维华5名中共党员和一些进步青年留在宁夏做工作，很快他们与国民军联军中的共产党员马云壁、贾一中等共同成立了中共宁夏第一个党的组织——特别支部，李临铭任书记。
1926年12月	国民军联军进驻盐池后，二十四旅政治部主任王恩培和罗成进、王自成等共产党员组建中共盐池县支部，王自任支部书记，并发展油漆匠李志恒、皮匠郭秉义和卖柴火的刘孝喜为共产党员。
1927年1月	16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司令冯玉祥和政治部副部长、中共党员刘伯坚率部离宁进驻西安。离宁时，成立了后方留守处，亦称办事处。中共党员，国民军联军第六路军政治顾问，国民联军国民党最高特别党部执委会常委王一飞任处长。机关设在银川鼓楼南街，国民军联军驻宁夏的后方留守处实际是我党的后方党委和接待处。
1927年2月	邓希贤（邓小平）、王涤亚（王成荣）、朱逸尘（朱世衡）3人由苏联回国途经宁夏，住在后方留守处。由后方留守处王一飞安排，在银川养病的中共党员孔广耀、彭桂林、刘贯一与从苏联归来的邓希贤等3人同行，他们临时组成一个6人小组，经吴忠、中宁、同心、固原、平凉、泾川、彬县、礼泉，咸阳等地于4月底到达西安。
1927年3月	19日，陕西省委决定，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划归陕西省委领导。特支共有6人，其中3人负责工运、国运、青运工作。
1927年4月	据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文件记载，中共宁夏特支此时有6名党员，其中工人1人，知识分子5人，正式党员5人，候补党员1人。由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共宁夏特支书记李临铭回陕西定边。

宁夏革命英烈

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赫光（上）

邢万莹

赫光（1902—1931年），原名万锡绂，字季玺，1902年2月9日出生，宁夏固原县杨朗镇万家堡子人。

赫光兄弟3人，他最小，父亲万成章是清朝秀才，由于受家庭熏陶，他自幼就勤奋好学。8岁入私塾，11岁入固原县高等小学，16岁考入甘肃平凉陇东公立中学堂（现平凉一中）。以著文为善长，他的一篇优秀作品，至今尚陈列在平凉一中的成绩展览室里。

1922年，赫光应招到北洋军阀吴佩孚办的洛阳讲武堂学习军事。由于马列主义在这里的传播，在进步同学的感染下，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读了国内的进步刊物《新青年》，这激发了他追求真理的革命思想。

1924年，赫光从讲武堂毕业，被吴佩孚任命为直属机枪连连长。接而擢升为迫击炮营营长。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败阵，赫光回到家乡，目睹了固原农村经济凋敝，人民群众穷困潦倒的惨景。正在这时，他接到了同学的来信，毅然离开了父母与妻子，踏上了新的征程。

赫光离家之后，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经过考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考虑他上过军事学校，打过仗，中共豫陕特委决定让他搞兵运工作。

高桂滋是国民党原驻榆林的头目，后到安徽阜阳，任国民党四十七军军长。在这支部队里，由于陕北党组织建立的较早，所以，早已有许多共产党员在那里活动。赫光受中央军委派遣，以国民党军部少校参谋的公开身份与苗广义、刘明德等中共党员一起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许多共产党员遭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入低潮。中共党组织将公开暴露的党员撤离，尚未暴露的同志仍然

隐蔽起来坚持斗争。赫光因有很好的隐蔽身份，所以他被留了下来。赫光很快看准了在军部当通讯员的齐渭川，经过做工作，讲述革命道理，齐渭川成了重要的秘密通讯员。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组织，赫光与中共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取得了联系，在特委的帮助下，党在四十七军的组织得到了恢复，并发展了党员。

1928年，蒋介石进行北伐，高桂滋部奉命由阜阳向山东开拔。经皖北特委同意，赫光等准备在金乡县羊山集举行兵变，但未能成功。从而吸取教训，为了掌握兵权，赫光千方百计离开了军部而当了营长。

1929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后，高桂滋部到山西平定县驻防。由于党的活动力量越来越大，到1931年，在高桂滋部已有五六十名共产党员，而且主要骨干都在赫光所在团，许多人都担任了下级军官，握有实权。由于党的思想工作，加上当时几个月不发饷，生活又非常艰难，鉴于此，中共北方局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指示中共山西特委将高部3个团拉出来，在五台山一带建立革命政权，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

山西五台山地区，党的力量强，群众基础好，山大沟深，地势险要，赫光根据中央决定，制定了兵变的周密计划，并到太原，向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作了汇报。

正当兵变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之际，1931年6月末，因叛徒告密，高桂滋突然将一团二营八连共产党员，排长刘玉珊逮捕。赫光急报山西省委，刘天章认为必须先发制人，立即兵变。山西省委进入了紧张工作，“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十一个大字由省委委员、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姜凝写成并由其爱人连夜绣在了红旗上。准备好的红二十四军袖章、布告、传单也及时送到了平定。经省委请示中央同意，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谷雄一协助赫光

领导兵变。赫光得知消息十分高兴。7月3日，骑马从阳泉火车站将谷雄一迎到平定，当即召开会议，传达省委决定，商定具体行动方案。此时适逢高桂滋下属3个团长去北京为其父祝寿，加上次日是星期六、晚上军官回家，士兵自由活动，戒备不严，于是决定4日晚12时举行兵变。一切准备就绪，不料师部手枪连一个党员班长酒醉泄密，于是赫光当机立断，下令提前半小时行动，攻占了司令部，救出刘玉珊。经过几次冲锋，虽没攻开城门，但他们散发和张贴了印有军长赫光名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布告》和传单，起到了宣传作用。

7月5日晨，起义军1100余人在孟县清城外交叉路口集中。谷雄一宣布：“经党中央批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正式成立。”然后，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选赫光为军长，谷雄一为政治委员。

7月8日至11日，红二十四军解决了一个保安团，又歼灭了一支保安队，把军队开到五台县的柏兰镇。13日，进入河北平山的蛟潭庄、柳木园一带。19日到达阜平县，20日，进驻城郊沙河岸停止前进。群众纷纷出来欢迎红军，并为红军筹粮筹款。接着，打开监狱，释放了全部在押政治犯及一般犯人。赫光军长在开狱释囚大会上发表了充满激情地讲话：“旧衙门是咱穷人的阎王殿，监狱就是鬼门关。天下穷人是一家，我们就是为穷人才暴动的。大家团结起来，打烂阎王殿，砸断铁索链，愿意闹革命的参加红军，不愿的请回家去吧！”话音刚落，几名青年“犯人”报名参加了红军。有的老人跪倒在地，热泪盈眶地说：“红军是咱穷人的救命恩人。我是欠了地主的账，被关进监狱的。我老了，不能从军，就让我儿子参加红军吧！”赫光和谷雄一连扶起老人，不几天，虽经劝说，老人仍然把儿子送来参了军。

（作者系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共党史专家）

移民岁月 第三十一期

YI MIN SUI YUE

六盘山林业恢复的踏路人——汪愚（一）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汪愚。（图片由本人提供）

汪愚：1926年出生，现年95岁。江苏省灌云县人，1951年南京金陵大学研究生硕士毕业，被分配到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工作，1953年调到北京中央林业部造林司、计划司工作，1956年评上了林业工程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下放宁夏，先后在泾源县、固原地区及林建师搞林业工作。曾任固原地区林科所所长，1980年调中央林业部三北林业局工作，任处长、副总工程师和总工程师。九三学社宁夏区委副主委、主委；五届宁夏政协副主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九届全国政协常委、1993年当选自治区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八届人大代表、常委；现身板尚硬朗，思路清晰。待人和善、德高望重是人们对他的评价。

汪愚的幼年正逢国民党统治时期，日寇侵略我国，连年战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的童年也在动荡中度过。5岁时跟随父母从江苏省灌云县搬迁到上海。

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的父亲对子女的教育特别重视。汪愚5岁时就被送到上海市比德小学读书，开始接触现代教育。1936年，全家又从上海搬迁到青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青岛沦陷，有着强烈爱国情怀的父亲不愿在日寇的铁蹄下受辱，带着全家从青岛逃难到四川成都。

汪愚：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南京

沦陷、青岛沦陷，当时的战乱每天都在变化，父亲带着全家逃难到了成都。我当时正好读小学六年级，后来中学也在成都县中上的，就是现在的成都七中，成都七中的前身是西汉大儒扬雄的墨池书院，很有名，成都七中的教学风气特别好，也是全国的名校。抗战胜利那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了金陵大学。毕业时成绩优秀，被吸收为中国荣誉学会的会员。之后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读研究生，取得了硕士学位。

1951年9月，汪愚被分配到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工作，在计划处、农政处从事农业、农村的调查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上下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在你追我赶的建设热潮中，有知识、懂技术的干部十分抢手。1953年，汪愚又被调到北京中央林业部造林司、计划司工作，参加过《林业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及《黄河总体规划水土保持》编制工作。由于工作认真扎实，3年后评上了林业工程师。这个时期的汪愚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是顺风顺水。1956年他在林业部加入了民主党派九三学社。

这时一场没有想到的事件发生了，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错划右派，下放宁夏，从此也扎根在了宁夏。

汪愚：我被错划成右派。原因是给领导反映了些群众意见，我是1956年在林业部参加的九三学社，九三学社有个规定，必须是工程师以上职称的人才能参加。我还被选为九三学社林业部支部委员。1957年全国搞大鸣大放，要求给政府和领导提意见。因为我是林业部九三学社支部委员，部里领导召开的整风提意见会都叫我参加，开始我没有发言，到了后期，部里的领导一再鼓励说：大家要积极发言，提意见是帮助组织上改正错误，是积极上进的表现。我听了这样的要求后，就把在群众中听到的一些意见提了出来，后来成了右派言论，被错划为右派。

1958年初，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在筹备成立阶段，各行各业都缺干部，中央政府这时向各部委发出了支援宁夏干部的要求。宁夏筹备工委也借这个机会，向国家各部委要人，请求援助些技术和管理型干部。林业部在贯彻中央支援宁夏的指示时，抽调了35名干部下放到宁夏，就这样，汪愚和35名同志一起登上了西行列车，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宁夏，时间为1958年3月。

（拜学英 王旭阳 藺银生）

用诗记录人生的优秀校长——崔正陵（一）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崔正陵：男，1935年出生于江苏盐城。1950年随家迁居上海。1957年从上海第二师范毕业，即分配到长宁区天山一小任老师。1958年随上海文教大队支宁，历任小学、初中、高中语文教师，中学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兼书记等职务。中学高级教师。业余喜爱诗词创作，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曾任宁夏诗词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华诗词文库·宁夏诗词卷》副主编、《当代诗词集成·宁夏卷》主编。已出版《百步斋诗文集》《平仄人生》《感事抒怀》等诗集。

崔正陵的人生有起有落、有悲有喜，正所谓《平仄人生》。青年时期的诗作多天宽地阔、信马由缰，中年后的作品更多感悟与忧思，50岁后的创作有礼赞、有企盼、有轻风细雨柔情似水的抒怀、还有策马扬鞭的奔腾激奋。

崔正陵喜欢诗词有祖父和外祖父的熏陶。祖父是清末民初淮安府名振一时的大律师，据《崔氏宗谱》记载，祖父为人耿直，作为律师，他拒贿秉公、扶正压邪，深得民望，50岁时，当地民众筹得了一块“保障人权”的金字大匾浩浩荡荡抬游四乡八镇，赠送给他。祖父喜欢写诗，外祖父北京政法大学毕业，也喜欢写诗。属诗香之家。这对崔正陵后来成为诗人有着潜移默化影响。

幼时的崔正陵所受教育较为完整，诗作以记述生活场景为多。

扑鼻清香稻上场，儿童翻滚正颠狂。牛拉石碾悠悠转，吆喝声声送夕阳。

1952年，崔正陵在一旧书摊上购得一本《唐诗三百首》，爱不释手，熟读于腹，这也对他后来诗作中多是七言绝律产生了影响。尽管出身书香门第，但他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枪炮声中留下了父亲当兵抗日的故事，也留下了不愿打内战，退出兵役教书湖口的记忆。可叹的是还背上了地主家庭出身、及历史反革命两个沉重的包袱。

崔正陵：初中毕业时，就因为地主家庭出身和历史反革命父亲这两个沉重的包袱，虽然入了团，却未能直升本校高中（华东师大附中），我赌气报考了师范。毕业后在上海市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后来也是因为这两个原因来到宁夏。

1957年崔正陵从上海第二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当地一所小学当老师，当年就赶上

了反右斗争，他也积极投身到运动中，还被学校评为反右积极分子。这时候的他一心向上，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人忘记他的出身，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出身不由己，选择在于个人。

1958年夏天，受左倾思潮影响较大的上海市搞了个纯洁城市人口工作，正考虑将上海市在反右运动中划定的右派、有历史问题的、家庭成分高的几类人群清理出上海。同一时期，宁夏回族自治区也进入了紧张的筹备成立阶段，需要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干部，最缺的是教师，向上海市提出请求，希望选派一批优秀教师支援宁夏。于是上海的500多名被打成右派的、有历史问题的、家庭成分高的人成批被派往宁夏。崔正陵没了选择，在校领导的动员下，报名支宁。

崔正陵：学校接到通知，要动员这些人报名来宁夏。动员时说是自愿，但没人敢不报名。我母亲当时有严重的肺病，姐姐远嫁，家中还有个不懂事的弟弟，给母亲说了报名情况后，母亲从床上爬起来，想去学校找领导，说明家里的情况，被我阻挡了。无奈中只能把年幼的弟弟带上，让母亲一人留在家。学校的书记动员我来宁夏时还说：去支援宁夏10年，就可以重回上海。上了火车后知道，很多学校都对支宁的老师有过这样的承诺，有的说5年，有的说10年，还有说15年的，最后这些承诺全没兑现，都留在了宁夏。

从上海开往宁夏的西行专列是1958年9月19日出发，车站送行的场面多是分离的伤感和悲泣，还有默默无声的隐忍和对前途的忧感。火车上他遇到了熟人张德甫，是上海一所中学的老师，崔正陵参加过批斗张德甫的大会，罪名是变质的共产党员。

旅途中气氛极为沉闷，整个专列除了队伍的几个人外，全是有问题的人。没人敢交流，也没人愿交流。都在默默的想着家人、想着前途，也在想着未知的宁夏。崔正陵说：来前对宁夏的了解就是唐诗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唐朝诗人王昌龄所作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也让他猜出，宁夏是个边陲之地，他查了地图，知道宁夏在地理上属塞外，生产力较为落后。

（藺银生 王旭阳）